

在周总理关怀下北京图书馆入藏的一批善本书

李致忠 徐自强

1965年11月，在周总理的亲自指示和过问下，从香港买回了一批我国古代的珍贵善本书。这对于研究我国古代文化科学的发展和校勘出版古籍等工作都具有重要价值。这是敬爱的周总理珍惜祖国文化遗产的实例之一。

事情是这样的，一位在香港居住的藏书家因某种原因，要将他多年收藏的一批十分珍贵的善本书出卖。消息传出后，不少外国人士都千方百计地想得到它。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闻知此讯后，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一方面指示有关人员进行联系，一方面责成文化部指派专人前去洽办。经过多方面的努力，终于把这批书买了回来。书到京后，周总理还抽出时间一一过目，并指示北京图书馆要妥善典藏，供广大研究工作者使用。

这批书分善本图书和碑帖善拓两部分。其中善本图书有：宋刻本《荀子》、《张承吉文集》，元刻本《梦溪笔谈》、《任松乡集》，元明间刻本《断肠诗词》，明翻元大德间平水曹氏进德斋刻本《尔雅》、明弘治间涂祯刻本《盐铁论》、明嘉靖刻本《泰山志》，清初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鲍参军集》、《汉书》，汲古阁抄本《小学五书》、《词苑英华》、《焦氏易林》以及清代乾嘉间学者孙星衍、洪亮吉校、顾千里跋的《水经注》等。碑帖善拓有：北宋拓本《神策军碑》、宋拓本《佛遗教经》，宋元拓本《蜀石经》、《嘉祐石经》、《大观帖》、元明拓本《绛帖》和明清拓《东海庙残碑》等。现选若干精华介绍如下：

《荀子》二十卷，宋刻宋印本。每半叶八行，行十六字。注文双行，行二十六字。白口，左右双边。字大如钱，墨如点漆，刻印精美，古朴大方。卷二十后有北宋熙宁间校勘官衔名，前人便据此定为北宋熙宁间国子监刻本，但考版心下方刻工姓名均系南宋刻书工人，足以证明此书系南宋浙江刻本。我们知道，八行十六字的款式是北宋国子监刻书的规格。此本虽然不是北宋熙宁间国子监刻本，但从书后有北宋熙宁间校勘官衔名和采用八行十六字的款式看，此书很可能是南宋国子监翻刻的北宋熙宁监本。当然南宋监本并不一定都是南宋国子监刻的。宋朝南渡后，偏安一隅，国力衰微，国子监往往下令有关州县校勘某书，将书版送监，就称为监本。浙江系南宋的直辖省，承担这种任务尤多。这部《荀子》的刊刻，很有可能就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因此，定它为南宋浙江官刻本比较恰当。

此书开卷有“道乡书院”、“孙朝肃印”、“士礼居”、“汪士钟藏”、“甲子丙寅韩德均钱润文夫妇两度携书避难记”、“韩应陛鉴藏宋元名钞名校各善本于读有用书斋印记”等藏书印鉴。证明此书在清代曾屡经孙朝肃、黄丕烈、汪士钟、韩应陛等人收藏。过去的士大夫和文人墨客得到善本书，多半是束之高阁，秘不示人。这部《荀子》就是长期为他们所把持，使得清代乾隆、嘉庆以后研究《荀子》的人，都因未见到此刻本而深感遗憾。售书的这位香港藏书

家，因藏有此书，十分珍视，曾给它的藏书楼取名“荀斋”。此书典藏北图后，为提供给各方面研究参考，文物出版社曾于一九七五年将此书影印出版。

《古迂陈氏家藏梦溪笔谈》二十六卷。元成宗铁穆尔大德九年（1305）湖南茶陵陈仁子东山书院刻本。陈仁子号古迂，南宋度宗赵禔咸淳十年（1274）举漕试第一，后五年南宋灭亡。入元后誓不出仕，营别墅于茶陵东山，专事讲学、著述和刻书。此本《梦溪笔谈》就是陈氏东山书院刻书之一。每半叶十行，行十七字，白口，左右双边。开本大，版心小，天头地脚都很宽，元时蝴蝶装，别具风格。

《梦溪笔谈》，北宋刻本早已失传。南宋孝宗赵昚乾道二年扬州州学刻本，清代时也已散佚。因此，现在传世最早的刻本，就是元大德九年茶陵陈仁子的这个本子。此刻本目次前，首附沈括自序及古迂陈氏刻书序。序末题“大德乙巳春茶陵古迂陈仁子刻于东山书院并序。”次附乾道二年左迪功郎充扬州州学教授汤脩年跋。目次后有“茶陵东山书院刊行”牌记。说明此本是直接承宋本而来的。此本明代为内阁藏书。开卷有明初“文渊阁”玉印及“万历三十三年查讫”朱记可证。入清后，又成为汪士钟“艺芸精舍”藏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人汇集“笔谈”的各种版本，参酌互校，出版了新本子。但终因未见到此本而感到美中不足。现在不但有了这个原本，文物出版社还影印出版了这个本子，这就为《笔谈》的研究和校勘工作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此外，这个刻本在印纸上也很有特色。据有关造纸的同志专门鉴定分析，认为此书是用皮纸印造，纸的表面有一层白色的石灰质，可能对防潮、防霉有一定的作用。此书已有近七百年的历史，但至今宛如新印，毫无霉霉现象。这又为研究古代造纸技术和图书防霉方法等，提供了实物材料。

《张承吉文集》，宋蜀刻十卷本。张承吉即张祜，又号张处士，中唐著名诗人。张氏一生留下多少作品很难详考。《唐书·艺文志》著录有《张祜诗》一卷。明朝朱警辑唐人诗，于嘉靖十九年刻成《唐百家诗》，其中，中唐二十七家诗人中收有《张处士诗集》五卷。清朝席启寓琴川书屋于康熙四十一年，又辑刻《唐诗百名家全集》，其中第二函收有《张祜诗集》二卷。清刘世珩辑刻《贵池先哲遗书》，其中在《贵池唐人集》中收有《张处士诗集》五卷。此外《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著录拜经楼吴氏有旧抄本《张承吉集》六卷。可见张氏文集的通行本为二卷本和五卷本，最多亦不过六卷。而这部宋蜀刻本《张承吉文集》却多至十卷：第一卷收张氏五言杂题七十二首；第二卷五言杂诗四十五首；第三卷五言杂诗四十七首；第四卷七言杂题五十首；第五卷七言杂题四十七首；第六卷五言杂题六十首；第七卷七言杂题三十八首；第八卷杂题六十四首；第九卷五七言长韵三十首；第十卷五七言长韵十六首；凡四百六十九首。这不但在收诗数量上，超过通行本，文字上也远胜通行本。为研究张承吉的创作思想、艺术风格乃至校正通行本的谬误等方面提供了最早最珍贵的版本。

此本每半叶十二行，行二十一字，白口，左右双边。字近颜体，初印精美，行格疏朗，

古朴大方，完全是宋蜀刻本的风格。

蜀本的特点是字体多似颜鲁公，字划肥劲朴厚。大多数是白口，左右双边。纸质莹洁，校勘精审，可与浙本相媲美。可惜南宋末年元兵进攻四川时，大肆焚毁抢掠，因此，蜀本流传到现在的要比浙本和建本少得多。

此本《张承吉文集》元时为官书，开卷有“翰林国史院”印鉴可证。清初为山东刘体仁七松堂藏书，有“颍川刘考功藏书印”可证。

《鲍参军集》、《小学五书》、《词苑英华》、《焦氏易林》、《汉书》同属清代毛氏汲古阁的影抄本。毛氏汲古阁的抄本在版本学的研究上历来享有盛名。特别是毛氏汲古阁的影抄本，就更为后世所珍重。《鲍参军集》系毛氏影宋抄本，其摹写之精，堪称独绝。此书宋刻本久已散佚，影宋抄本亦仅见此本。文字可校正通行本处甚多。世称“毛抄仅下宋本一等，”此本则是享有这种盛名的代表作。其它如《小学五书》、《词苑英华》、《焦氏易林》、《汉书》等，也都具有重要的文献资料价值。尤其是影宋抄本的《汉书》，其摹写工致绝伦，形神逼真，很似宋刻。

《神策军碑》全名为《皇帝巡幸左神策军经圣德碑》，崔铉撰文，柳公权正书。会昌三年（843年）立于皇宫禁地，外人很少能得见者，椎拓更为困难。从宋至今只传此一种，世称“宋拓孤本”。此册，宋拓、库装、硬镶、剡裱。裱本每半开长（即高）34、宽22.7厘米，心子每页长26.5、宽15.5厘米。大字每页3行，中字每页4行。现存五十四页，尚缺一开（二页）。据安岐《墨缘汇观》记载，此碑“墨拓本、宋装裱、正书、计五十六页；后文至嘉其诚止”。现在，此本只二十七开、五十四页，从拓本剪条后每条的小字编号看，其四十二与四十三页之间，正好缺一开二页，六行三十字。可见此一开之缺，当在安岐收藏之后。碑文从开始至“来朝上京嘉其诚”的“诚”字止，为碑的前半，以下全缺。欧阳修《集古录跋尾》未见著录，赵明诚《金石录》只列碑名，分为上下二册。故碑可能在北宋时已不存在，而此本很可能为唐末五代所拓。

此本流传有绪，递藏分明，在现存拓本中是少有的。可考的最初入藏者，南宋时为权相贾似道所有，拓本首页有“秋壑图书”印记可证。入元后为官书，有“翰林国史院官书”条记。明初，先归内府，后入“晋王”家，拓本中有“洪武六年闰十一月十八日收”的小金字记载和“晋府图书”印。清初，又归北平孙承泽，后为梁清标、安仪周（安岐）、张蓉舫、陈介祺等递藏。

神策军建立于唐玄宗天宝十三年（754），初设在甘肃临洮，为边防守军，后来演变为五大禁军之一。唐德宗贞元时，分神策为左右厢，而且均由宦官分统。柳书《神策军碑》记载的就是唐武宗李炎巡幸左神策军时的情形。内容当然是歌功颂德，史料价值不高。但在保存柳字方面，则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我国书法的发展，到唐时已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欧、褚、颜、柳即为当时各派书家

代表，被人们誉为唐代书法四大家。柳公权、字诚悬、生于大历八年（773），卒于咸通元年（860），为唐代后期著名书法家。柳字笔法瘦劲，自成一派，为历来学大楷者的范本。此碑为柳公权晚年（71岁）所书，比人们熟知的代表作《玄秘塔》，笔法更为精练遒劲。加之摹刻精工，拓碑时代较早，拓工手法亦佳，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柳字神韵，实为现存柳书中最佳者，是我国书法艺术的珍品。一九七四年，文物出版社将此拓本影印出版，为广大书法爱好者和研究家们，提供了更为方便的条件。

《佛遗教经》全名为《佛海涅槃略说教诫经》，宋代麻纸毡拓、硬镶、剡裱、墨镶边。曾是明代永乐宣德年间官吏袁宗彻的家藏，后归范氏天一阁。范大澈在其所著《碑帖纪证》一书中曾有著录，时人文彭等也曾过目或者收藏过。清初归安仪周所有，以后则被清庭内府收藏，乾隆、光绪、宣统等皇帝均钤有鉴赏玺印。此碑，在宋初，人们就盛传为王右军书，独欧阳公认为不然。以后，虽也常说：“大字莫过瘞鹤铭，小字莫过遗教经”，因见其笔法道媚，也仍把它传为王羲之所书；但其实，《瘞鹤铭》乃陶弘景笔迹，《遗教经》乃唐释道常所书，均与王右军无关。不过，此拓本书法甚精，有晋唐小楷风韵，确为重要的书法珍品。

《东海庙碑》，东汉灵帝熹平元年（172）立于江苏海州。隶书。阳刻碑文，阴有重修祠时的刻字。南宋洪适在其所著《隶释》中曾录有碑文和碑阴刻字，但同时也指出：“海庙一椽不存，自今非四十年前旧物，不复见此刻矣。欧阳公时，天下一家，汉碑虽在遐陬穷谷，无胫而可至。《集古录》中已屡言难得，可为宝，况今乎！”可见，在宋时，此碑已不复存在，洪氏著录，可能也仅据拓本。明、清时，诸家著录均未及此。现在要收此拓本，就是较佳翻本也极难得。此次入藏者，为翻刻本。明或清初拓，硬镶、剡裱、墨镶边。阳存字九、阴存字十七。道光二十一年（1842）前后发现于淮南，曾为顾湘舟、谭敬、徐渭仁等收藏，并有时人梁章钜、钱泳、费昶怀等的题跋，可为研究考证的参考。

《大观帖》，北宋大观三年（1109）一月，徽宗诏刻，蔡京书签及卷首，立石于太清楼。此次收集入藏者，经折装，存二卷。卷一，淡墨宋拓，收东汉章帝至唐代高宗等历代帝王草书和行书帖十七种。卷二，浓墨元明拓，翻刻本，收东汉至晋的历代名臣：张芝、钟繇、王象等草书、行书、小楷帖十九种。草书字旁有乾隆嘉时人徐真木的朱笔注释。

《绛帖》，北宋潘师旦所摹刻。他以《淳化阁帖》为底本而有所增损。淳化三年（992）刻于山西绛州，故称《绛帖》。以后，刻此帖者甚多，有补刻“公库本”、“私家本”及伪刻十二卷本等，其它翻刻则不胜枚举。这次收藏的《绛帖》、存二卷，翻刻本，元或明初拓，曾经明代中叶著名书法家周天球等过目或收藏，亦为少有的书法资料。

《蜀石经》，始刻于五代后蜀孟昶广政元年（938），故又称《广政石经》。毕工于北宋宣和六年（1124），前后历时一百八十余年。孟昶始刻时，以唐文宗大和本“经”书为底本，加上各家注疏，由张德钊等用楷字书写，陈德谦等刻石，宰相毋昭裔校勘督造。刻了《易》、《诗》、《书》、《仪礼》、《礼记》、《周礼》、《左传》（一至十七卷）、《孝经》、《论语》、《尔雅》

等十种；北宋时，经田况等书写，刻全《左传》（十八至三十卷），又续刻了《公羊传》、《谷梁传》、《孟子》三种，共为十三经。竣工后，立于成都府学石经堂。该经，在南宋初期尚完好，到理宗嘉熙、淳祐以后始亡，元明之际不闻。现在，石经拓本也十分稀少。此次入藏的《蜀石经》，计有墨拓本七册，其中《左传》、《谷梁传》、《周礼》各二册，《公羊传》一册。道光年间木刻《蜀石经》印本一册，《蜀石经题跋姓氏录》一册。墨本年代均为宋元拓，其中《左传》册页上钤有“东宫书府”等宋代内府官印，可证为宋拓无疑。墨本中还有清乾隆嘉庆时的著名金石家翁方纲等数十人的题跋和观款，对《蜀石经》的研究，提供了不少可贵资料，可为今天研究参考。尤其在“经”文中加刻注文，为历代石经所无，为宋人所重视，也为今天保存了不少资料。

《嘉祐石经》，北宋仁宗庆历元年（1401）开始刊刻，嘉祐六年（1061）竣工，书体一篆一真相间，故又称《二体石经》。书石者为杨南仲等人。刻石后，立于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太学。靖康之变，赵构南迁，石经残毁，金、元时虽又补刻，元末又佚。现在，仅在开封博物馆存有少部份原石。今天，就是拓本也极少。此次收藏的四巨册《嘉祐石经》，包括《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周礼》、《孟子》等七种，量达三百七十多页，三万多字，实为北京图书馆收藏石经中最好的一种。此本原为清人丁晏于咸丰七年（1857）五月发现于淮安书肆，收购回家，重装为四巨册。当时，另外还装有名人题记一卷，未与这四大册连属。因此，后来转卖时，未一并出售。此卷题记现藏上海图书馆。这几册石经，均为宋、元墨拓。经多次装订，最后为丁晏所重装。大幅经折裱褙，极为壮观。

从以上介绍，可见北京图书馆入藏的这批善本图书和碑帖善拓，其意义是多么重要。因此，每当我们展视和利用这批珍贵资料时，总要想起敬爱的周总理，缅怀他对我国文化遗产的无限珍视，激励我们更加努力地工作。

（此文原载《文献》1979年第一辑，经作者同意转载。）

周恩来总理关心陈清华藏书的一段轶事

赵深先生回忆：1965年陈清华藏书购回馆之后的某一天，当时任北京图书馆善本部主任的赵万里先生去馆里上班，下班后很晚没有回来，家人很着急。夜里12点后，赵先生坐图书馆的小车回来，显得很兴奋，说今天在中南海紫光阁向周总理介绍了新买的陈清华藏书。赵先生说，当天下午，北图奉命到紫光阁，把陈清华书环布在桌子上展示。总理很晚才来，逐书一一看过，边看边议论，比如某书上有溥仪题字，总理问是不是从宫中出来的等等。赵先生曾对总理谈到书的价格，说花了国家20万元港币，是不是太贵了。总理说，不要紧的！我们去香港演两天戏，这钱就回来了。赵先生平时不对家人谈图书馆的事，这天实在是太激动了。

（注：赵深先生为赵万里先生长子，此文为赵深先生口述，现任善本部主任张志清整理）